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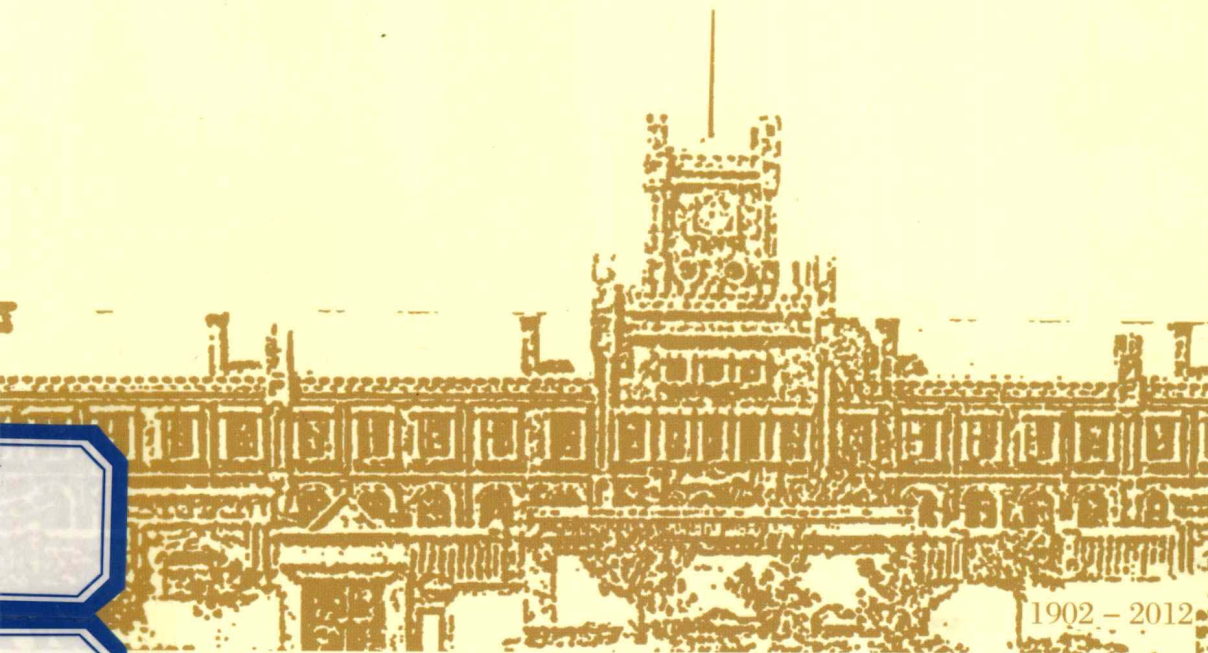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

抵抗异化：索尔·贝娄小说研究

DIKANG YIHUA SUOER BEILOU XIAOSHUO YANJIU

白爱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1547899

抵抗异化：索尔·贝娄小说研究

DIKANG YIHUA SUOER BEILOU XIAOSHUO YANJIU

白爱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抵抗异化：索尔·贝娄小说研究/白爱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

ISBN 978-7-5161-0673-0

I. ①抵… II. ①白… III. ①贝娄, S. —小说研究
IV. ①I712.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3498 号

抵抗异化：索尔·贝娄小说研究 白爱宏著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孙晓晗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李恒东

封面制作 大鹏设计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39570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 - 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序 言

2012 年 5 月 8 日，山西大学将迎来 110 年校庆。为了隆重纪念母校 110 年华诞，系统展现近年来山西大学创造的优秀学术成果，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山西大学诞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时代，在“西学东渐，革故鼎新”中应运而生，开创了近代山西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百年沧桑，历史巨变，山西大学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学术实践，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办学业绩。百年校庆以来，学校顺应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创新，实现了新的跨越和腾飞，逐步成长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实力雄厚的具有地方示范作用的研究型大学，谱写了兴学育人的崭新篇章，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大学因学术而兴，因文化而繁荣。山西大学素有“中西会通”的文化传统，始终流淌着“求真至善”的学术血脉。不论是草创之初的中西两斋，还是新时期的多学科并行交融，无不展现着山大人特有的文化风格和学术气派。今天，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正是传承山大百年文脉，弘扬不朽学术精神的身体力行之举。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的编撰由科技处、社科处组织，将我校近 10 年来的优秀科研成果辑以成书，予以出版。我们相信，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对于继承与发扬山西大学学术精神，对于深化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对于促进山西高校的学术繁荣，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谨以此丛书献给历经岁月沧桑，培育桃李芬芳的山大母校，祝愿母校在新的征程中继往开来，永续鸿猷。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郭贵春' (Guo Guochun).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fluid, cursive style.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导 论

索尔·贝娄 (Saul Bellow, 1915—2005) 1915 年夏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郊外一小镇犹太人家庭, 家境贫寒。1924 年迁入美国芝加哥。1933 年贝娄入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 就读, 后转入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主修社会学与人类学, 1937 年毕业, 获学士学位。1944 年发表第一部长篇作品《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 Man*), 40 年代末获古根海姆基金 (Guggenheim Fellowship) 资助, 居留巴黎两年 (1948—1950), 于此期间创作后被认为其成熟之作的《奥吉·马奇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此后陆续总共发表十四部长篇小说, 四部短篇小说集, 一部回忆录, 一部散文集。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文坛最具影响的作家之一。

贝娄在长达 60 年的创作生涯中, 获得了众多荣誉, 其中三次获国家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 1976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988 年获国家艺术奖章 (National Medal of Arts)。梅勒把贝娄看做是“我们这一代中最具想象力的作家。”(qtd. in Quayum and Singh vii) 马林 (Irving Malin) 1969 年时称贝娄“可能是最重要的在世作家,” (*Saul Bellow's Fiction* xi) 克罗宁 (Gloria L. Cronin) 和戈尔德曼 (L. H. Goldman) 1989 年时认为, 贝娄“在战后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只有本世纪初的海明威和福克纳可比”。巴奇 (Gerhard Bach) 1995 年时则写道:“50 年来, 索尔·贝娄一直是一位异常坚定的记录者, 他记录了美国人对确定自我的不懈追寻, 同代人中他最为杰出、最为一

致地表达、揭示了美国社会的共同需要与罪恶。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把握时代脉搏,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

论者对贝娄重要性的具体表述可能有所夸张,但贝娄在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却毋庸置疑。在艺术创作上,贝娄继海明威与福克纳而起,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有所继承有所批判,为美国文学开辟了新的方向;在内容上,他的作品既反映了犹太少数族裔在美国的文化融入的历史历程,也反映了美国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变迁、反映了在史无前例地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美国主流社会精神状态的变化。如果要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文学,了解犹太少数族裔在美国的文化融入,了解美国主流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追求、困惑、焦虑与希冀,贝娄是一个重要窗口。

美国最早对贝娄作品的评论发表于1944年3月25日的《纽约时报》,是由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所写的关于《晃来晃去的人》的书评。从1964年起到20世纪60年代末,贝娄批评出现了一个高潮。1964年可以说是贝娄批评的分水岭。这一年,虽然尚无专著出现,但有关贝娄的文章从过去每年经常不足20篇的规模一下暴涨至70余篇,次年即1965年第一部专著出现,由此到60年代末批评专著与评论性文章大量涌现,形成了贝娄批评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的评论主要集中于《晃来晃去的人》到《郝索格》等作品,探讨分析贝娄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异同,认为他不像以艾略特和乔伊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那样否定当代生活。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如《荒原》等弥漫着一种虚无主义与悲观主义,而贝娄则对生活采取一定程度的乐观态度,对生活的未来仍然满怀希望。代表性的评论作品是谭纳(Tony Tanner)的《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65),奥普达尔(Keith Michael Opdahl)的《索尔·贝娄长篇小说论》(*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 (1967),克雷顿(John Jacob Clayton)的《索尔·贝娄:人之卫士》(*Saul Bellow: In Defense of Man*) (1968)三部专著。谭纳的《索尔·贝娄》也是第一部贝娄批评专著。在这部书中,谭纳在指出了他的作品情节松散的缺点的同时,率先比较了贝娄的作品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区别,指出了贝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人的命运的一定程度上的乐观与希望。奥普达尔则认为,贝娄所有的作品

都表达了同一个问题，即调和向往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他塑造了极度需要社群的主人公，但那些主人公进入他笔下的社群却是以毁灭为代价的。”（5—6，表页码，后文同）克雷顿在《索尔·贝娄：人之卫士》中则认为贝娄的作品中有“三种相互关联的矛盾”，即贝娄既反对文化虚无主义而同时又恐惧这种生活空虚、他“拒斥异化而同时其主要人物又全是自虐者和异化者”、他反对个人的贬值而同时他又不得不抛弃个性。（3—4）总之，第一阶段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对贝娄进行定性研究即贝娄是属于哪一种传统的作家上。在上述三部重要评论专著中，尽管论述分析的角度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贝娄在面对异化的同时，也是一个对现代生活采取肯定态度的作家，他的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在异化世界中抵抗异化、追寻构建其所向往的人的特性的的小人物。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贝娄批评在第一阶段的定性认识框架内展开。由人文主义作家这一基础出发，评论界开始关注贝娄作品中的具体问题，如叙事方法和主题模式等。达顿（Robert R. Dutton）认为贝娄不再沿袭现代主义文学中常见主题，即将人看作困陷于各种自然主义式力量中的受害者，而是将人看作准天使，因此达顿在《索尔·贝娄》（*Saul Bellow*）中要着力回答如下问题：“如果作家索尔·贝娄弃离过去文学对生活经验的理解与描述，贝娄又将以什么取而代之？”（7）并考察了贝娄作品中的常见主题。波特（M. Gilbert Porter）的《力量源于何处》（*Whence the Power*）从形式主义批评角度，结合新批评的细读法，对贝娄的作品进行了研究，认为贝娄属美国文学中悲观与乐观两种传统中的后者。^①柯亨（Sarah Blacher Cohen）的《索尔·贝娄作品中的笑研究》（*Saul Bellow's Enigmatic Laughter*）通过对《晃来晃去的人》到《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等七部小说的分析，认为喜剧性因素是贝娄用以抵抗悲观绝望的重要手段。库尔舍莱斯塔

① 波特（M. Gilbert Porter）认为清教主义、自然主义和当时的黑色幽默属悲观传统，这种传统将人看作是完全的受害者，毫无掌控自己命运的希望；另一种是乐观主义传统，可追溯到阿米尼亚主义（Arminianism）、贵格会教、自然神论、唯一神教、宇宙神教和超验主义。这种传统和前者相反，认为人具有成为“抵抗英雄”（a resistant hero）的资质。见 M. Gilbert Porter, *Whence the Power*（Columbia,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4），pp. 192—195.

(Chirantan Kulshresta) 的《索尔·贝娄:积极态度的问题》(*Saul Bellow: the Problem of Affirmation*) 则认为正是贝娄的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导致了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持续不断的焦虑。20 世纪 70 年代仅贝娄批评专著就达十多部, 尽管批评角度不同方法各异, 但还是有其共同之处, 即“尽管这些批评论著均丰富了早期的批评成果, 但只是略微调整了对贝娄的‘正统’看法——一位人文主义者、当代生活肯定者。”(1) 也就是说, 这一时期的贝娄批评是第一阶段的延续和深化, 没有出现质疑或挑战贝娄是反现代主义者、当代生活肯定者这一看法的声音。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贝娄批评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阶段评论界在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的同时, 也开始尝试改写第一阶段对贝娄的定性定位。麦卡顿 (Joseph F. McCadden) 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逃离女性——索尔·贝娄小说研究》(*The Flight From Women in the Fiction of Saul Bellow*), 这是第一本探讨贝娄作品中女性人物的专著。谭纳在 1965 年出版的《索尔·贝娄》中, 第一次梳理了俄罗斯文学、犹太裔文学和美国文学传统对贝娄的影响。和谭纳不同, 布拉德伯利 (Malcolm Bradbury) 在《索尔·贝娄》(*Saul Bellow*) 一书中, 重新考察了欧美思想传统对贝娄的影响, 认为贝娄并非简单继承旧有传统, 而是在吸收传统之后形成了与诸传统不同的独特的自我风格。戈尔德曼的《索尔·贝娄的道德视界——犹太文化影响研究》(*Saul Bellow's Moral Vision: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Jewish Experience*) 则从道德的角度探讨了犹太传统对贝娄的影响, 认为其影响之深广远远超乎贝娄所承认的程度。纽曼 (Judie Newman) 在《索尔·贝娄与历史》(*Saul Bellow and History*) 中质疑了此前评论界的共识, 即贝娄更多地关注普世而非具体、更多地关注永恒而非历史。纽曼在承认贝娄作品中的超验因素极为重要的同时, 提出贝娄小说中的情节、人物和主题都贯穿着一种历史感。富奇 (Daniel Fuchs) 在《索尔·贝娄——想象力与修改》(*Saul Bellow: Vision and Revision*) 中, 通过比较贝娄每部小说的不同草稿, 追踪、分析了贝娄的创作及修改过程。威尔逊 (Jonathan Wilson) 在《贝娄小说论——另面解读》(*On Bellow's Planet: Readings from the Dark Side*) 中则力图解构此前评论

界的共识,即贝娄是一位当代生活肯定者、一位人文主义作家。他认为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世界是一个敌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活着的是色色各类的畸形人,他们在欲望与价值观念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并认为贝娄的小说更多地揭示了作者本人而不是他所生活的美国。皮弗(Ellen Pifer)在《索尔·贝娄新论》(*Saul Bellow Against the Grain*)中认为,贝娄并不是评论界历来认为的现实主义作家,而是一位极具激进性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不同的是,大量的事实与细节的堆积损害了其自身,由此颠覆了现实主义者对物质环境和表象世界的传统信念。他的作品比一般认为的更能激发读者思考、也更大胆。格伦迪在《索尔·贝娄与人文主义衰落》(*Saul Bellow and the Decline of Humanism*)中认为,长期以来对贝娄的“人文主义福音传道者”的评价需要重新审视;认为贝娄作品中的主人公均为失败的人文主义者,这些被美国社会所拒斥者,在基本需要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别无办法只好采取退走策略。(11—12)海兰德(Peter Hyland)在《索尔·贝娄》(*Saul Bellow*)中则认为,折中主义(eclecticism)是贝娄在美国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这不仅使他得以涉猎各种传统与文化领域,为他的作品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也给他提供了考察现代美国多元特性的工具。(2)金京爱(Kyung-Ae Kim)的《追寻救赎——索尔·贝娄小说论》(*Quest for Salvation in Saul Bellow's Novels*)从犹太基督教和禅宗的视角考察贝娄的救赎观,审视其自我为救赎之源、顿悟为救赎之道的观念。他认为,贝娄的小说是在着力探索人类在当代混乱虚无的世界里得以重生与救赎的可能性。(23—24)克罗宁在《他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His Own: In Search of the Feminine in 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中,力图证明贝娄的男性中心文本表现的是对缺席的母亲、情人、姐妹、女性朋友、女性精神等的追寻。这一女性形象躲避着贝娄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而这些主人公们则在西方哲学、伦理学及超验思想中抽象地寻觅他们无法完全理解的女性。由此这些主人公们产生了对他们自身社会环境中的女性的颇具讽刺性的拒斥,由此产生了对这些缺少的女性的愤怒而憎恶性的描述,主人公们深陷男性文化,将女性描述为具有毁灭性,这些描述老套而模式化。(2)奎亚姆(M. A. Quayum)详细探讨

了贝娄作品与美国超验主义的相同之处,认为贝娄与美国超验主义作家——尤其是艾默生与惠特曼——极为相似,因此贝娄“首先应该被看作是新超验主义作家”。(2)

20世纪90年代中期,贝娄短篇小说研究出现较大进展,出版了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弗莱德里奇(Marianne M. Friedrich)在《索尔·贝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与叙述》(*Character and Narration in the Short Fiction of Saul Bellow*)中,以文学整体论为出发点,通过聚焦人物与叙述形式的关联,力图对贝娄的短篇小说做出新的定位,即将其看作是独立的艺术作品,而不只是长篇小说的萌芽或指南。

20世纪80年代以来贝娄研究界的另一个领域是贝娄传记的创作。1980年,哈里斯(Mark Harris)出版了采用严格纪实手法写成的《索尔·贝娄——德拉姆林的土拨鼠》(*Saul Bellow: Drumlin Woodchuck*)一书,该书笔触灵动地记录了哈里斯与贝娄在1969年至1979年这10年间的交往,书中既书写了贝娄的才华与魅力,也没有回避哈里斯眼中贝娄的缺点。贝娄的第二部传记于1991年出版,在这部名为《索尔·贝娄——想象力传》(*Saul Bellow: A Biography of Imagination*)的传记中,米勒(Ruth Miller)以传主朋友的角度与立场,用传记批评的方法解读贝娄的作品,将贝娄的生活与他的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沃瑟曼(Harriet Wasserman)于1997年出版的《惬意——历险与索尔·贝娄同行》(*Handsome Is: Adventures with Saul Bellow*)则以与贝娄相处相交25载的朋友兼经纪人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记录了她眼中的贝娄。书中既有对他们友谊的回忆,也有对他们关系破裂后的愤懑。2000年,阿特勒斯(James Atlas)历时十载、精心撰写而成的《贝娄传》(*Saul Bellow: A Biography*)出版,该书从生活到作品,从贝娄出生一直到出版前夕,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探寻了贝娄的人生轨迹和内心世界。在这部传记中,阿特勒斯将贝娄的命运置于与贝娄同代的犹太移民在美国的文化融入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书写了贝娄的成功,也书写了贝娄的缺点。

国内的贝娄研究据笔者查考最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1978年陆凡先生于《现代美国文学研究》第2期发表《〈洪堡的礼物〉及其作者索尔·贝娄》一文,次年又于《文史哲》第1期上发

文《美国当代作家索尔·贝娄》，内地的贝娄研究由此滥觞。20世纪80年代，贝娄研究刚刚起步，80年代十年间，有关贝娄的文章仅十数篇；进入90年代，贝娄研究开始大踏步发展，由80年代十余篇增长为近40篇，文章也从初期的多为评介性质进入研究性质，内地学者开始从叙事艺术，女性意识，作品主题，哲学思想等各种角度对贝娄作品加以深入探讨和研究。如李为民从存在主义思想的角度考察贝娄的作品，认为到当时为止贝娄出版的十多部小说不仅存在主义色彩浓厚，“而且都是沿着存在——自由——虚无这样一条存在主义人生之路前进的”，贝娄的小说“主要反映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在这样异化现象下一种灵魂的躁动与生命的叹息”。（82）徐新梳理贝娄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创作生涯，将其分为四个阶段：“步入文坛时期”、“趋向成熟时期”、“成熟时期”与“暮年时期”；^①认为贝娄在思想与创作上存在“两重性”。（164—166）韩维评析贝娄80年代末出版的两部作品，在分析中篇小说《偷窃》时认为，“小说表现出作者对女性精神发展的关切，但它的内涵又显然超越了描写女性经验的狭窄局限而具有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新颖的视角 87）对于《更多的人死于伤心》，韩维认为贝娄是“以喜剧的形式寻求‘一种更加广泛、更加灵活、更加丰富、更有条理、更为全面的叙述，阐明人类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谁，活着为什么等等问题’。（生活的喜剧 99）廖七一对《奥吉·马奇历险记》中的神话母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贝娄在这部小说中“将严肃的道德观念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丰富的神话意象和原型结构完美的结合起来”，小说中“存在表层和深层两个结构层次以及三个既相互平行，又相互交叉的神话意象和母题。”（5）苏晖则关注贝娄小说中的心理模式，认为贝娄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离群索居，进行精神探索，努力寻求生存的立足

① 徐新对贝娄作品的时期划分：第一时期主要作品为《两个早晨的独白》（1941），《晃来晃去的人》（1944）和受害者；第二时期即“趋向成熟期”，主要作品为：《奥基·玛琪历险记》（注：徐新先生在文中的小说译名，即本书中的《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勿失良机》（1956）与《雨王汉德森》（1959）；第三时期即“成熟期”，主要作品为：《院长的十二月》（1982），《做了错事的他及其他故事》（1985）和《越来越多的人死于心病》（注：即本书中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1987）。

点,探寻人生的真谛,而最终都归于失败”,并认为这些主人公“都经历了一个由焦虑到探索最后导致回归的心理流变过程。”(34)汪海如剖析贝娄笔下职业女性的女性意识,对国外评论界否定贝娄塑造的女性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贝娄“历史地、真实地再现了不同时代职业妇女的精神面貌,同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她们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60)王云弟从叙事的角度阐释《赫索格》,认为作品的主人公“作为一种非在的叙述者”,力图“去驾驭并占有叙述文本,试图在叙述的各个层面上打上自身的印记。”(65)王阳则认为贝娄小说中存在一种“二项对立”——抽象与具体的对立——的小说修辞技巧,贝娄成功地使“抽象概念服务于艺术表现的生动具体性要求”。(48)刘文松着眼于《赫索格》在贝娄所有作品这一系统中所处的位置,认为该小说在贝娄的创作中“承上启下”,既是此前作品的总结,又开启了其“后期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的创作。(167)郁青则比较了《雨王汉德森》与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认为前者“创造性地”“继承与模仿”了后者,由此贝娄表达了“对人类及当代社会的独到见解”。(90)20世纪90年代内地的贝娄批评虽然论文数量不算多,论者关注的作品也多为几部重要作品,但批评已具相当深度,让人印象深刻。

进入21世纪以来的10年间,内地贝娄研究出现突破性进展:2002年,南京大学刘海平教授与王守仁教授主编的四卷本《新编美国文学史》出版,第四卷的第一章以近七页的篇幅对贝娄的创作生涯进行了细致深入的阐释与评述。同年,宋兆麟先生主编的《索尔·贝娄全集》(共十四卷)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04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由胡苏晓先生翻译的贝娄长篇新作《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后者的出版标志着内地贝娄作品翻译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即贝娄的重要作品内地已均有译本。另外两个需要特别提到的事件是,2003年内地第一本贝娄传记《贝娄——二十世纪文学泰斗》出版。在此书中,厦门大学青年学者周南翼以贝娄作品为主线,讲述了一个“一生致力于超验的、精神的追求”的贝娄的故事。国内贝娄研究的另外一件大事是,2003年内地第一本贝娄研究专著出版。在这本名为《索尔·贝娄小说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女性表征》(*Saul Bellow's Fiction:*

Power Relations and Female Representation) 的英文专著中, 青年学者刘文松从福柯的权力关系视角, 分析了贝娄作品中的五种权力关系——“夫妻之间的知识和权力关系, 婚姻中的经济关系, 情侣之间的情感权力关系, 母亲的权力, 以及女主人公/叙述者对自己和他人的权力”——和女性表征, 认为在贝娄作品中, “大多数女性都很活跃主动, 不是被动的受害者。”此后几年间, 陆续又有数部专著出版。2005 年,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周南翼的博士学位论文《追寻一个新的理想国: 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与辛西娅·奥芝克小说研究》(*Toward A New Utopia: A Study of the Novels by Saul Bellow, Bernard Malamud, and Cynthia Ozick*)。周南翼在该论文中, 关注三位作家所属的第二代移民的经历, 探讨三位作家融合犹太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精髓, 以突破美国社会困境的努力。同年, 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吴玲英、蒋靖芝著《索尔·贝娄与拉尔夫·埃里森的“边缘人”研究》(*Marginal Protagonists' Journey: A Study on Saul Bellow and Ralph Ellison*)。该书探讨了四部作品——《晃来晃去的人》、《看不见的人》、《雨王汉德森》和《赫索格》中知识分子边缘性的表现形态。2007 年, 张钧出版了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研究贝娄专著《夕阳尽处是长安: 索尔·贝娄早期小说研究》(英文) (*Passover from Darkness to Light: A Study of Saul Bellow's Early Fiction*)。该书以贝娄早期作品为研究对象,^① 着重考察贝娄六部作品中的相同主题, 探索贝娄作为艺术家的成长轨迹。2009 年, 郑丽的博士学位论文《解放潘多拉: 贝娄四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两性关系研究》(*Liberating Pandora: A Study of the Female Images and Bisexual Relationship in Saul Bellow's Four Novels*) 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从后现代主义及女性主义的视角考察贝娄的四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关系。

此外,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里, 深入研究贝娄文学作品的博士学

① 其研究的六部作品为:《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 Man*),《受害者》(*The Victim*),《奥吉·马奇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只争朝夕》(*Seize the Day*),《雨王汉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赫索格》(*Herzog*)。

位论文数量也大幅增加。除上述已经出版的几篇之外,博士学位论文至少还有六篇。2001年魏啸飞的《美国犹太小说中的犹太精神》在第五章讨论了贝娄的《愁思伤情》中的犹太精神,认为主人公“贝恩·克拉德对犹太传统精神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贝娄在此小说中表达的是其“渴望用犹太精神来保护和珍藏人类生命火种”的情怀;(89—115)2007年,祝平的《乌云后的光亮》探讨了贝娄获诺贝尔奖之前的六部中篇小说中的“伦理指向”与“道德意义”,认为贝娄对“个人,群体和人类”具有“不灭的信心”;2008年汪汉利的《索尔·贝娄小说的文化渊源》则从“犹太情结、美国观念和欧洲影响”三个方面来考察贝娄文学创作的“文化品质”;买琳燕的《从歌德到索尔·贝娄的成长小说研究》,重点在于研究“成长小说”的产生及发展过程,其中涉及了贝娄的《奥吉·马奇历险记》;2009年王玲的《索尔·贝娄主要作品中男主角的受害特征》以贝娄的三部作品入手,力图揭示贝娄所有作品中的男性主人公所具有的某些最具典型意义的受害特征;籍晓红的《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则从文化批评的视角探讨贝娄中后期作品中所体现的后工业社会的人类生存困境。

2000年以来,内地关于贝娄的期刊论文也大量增加,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尤其从2005年开始至2009年年底,关于贝娄的学术论文数量每年高涨至30—40篇左右。论者关注的作品开始从贝娄的重要作品向其他作品拓展。这一时期在论文数量猛增的同时,论文深度也维持了相当的水准。研究视角多种多样,如原型批评,女性批评,修辞学批评,文化视角,艺术探讨,主题研究,哲学思想研究,精神分析,等等,但总的框架是赞同贝娄是一位人文主义作家,没有像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贝娄研究界那样出现颠覆性的研究成果。如周南翼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探讨了贝娄三部作品中的父亲形象,认为贝娄的小说“侧重表现的是受难的灵魂渴望精神家园的主题,而他笔下的主人公所追寻的精神家园,往往是指充满兄弟情谊的社会,人们相亲相爱,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69)李鑫华从肯尼斯·伯克的新修辞学角度阐释贝娄的短篇小说《寻找格林先生》,认为“人生是一个认同的过程。寻找也是一个认同的过程”,过程有时比结局更重要,

“认同的过程具有不恒定的意义。而正是这种不恒定性却往往是恒定的人生意义之所在。”(22) 邹智勇探讨了贝娄若干作品中的犹太性与形而上性,认为“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犹太性不仅反映了犹太民族在文化变迁和文化适应中所面临的难题,同时也揭示了在精神文明道德大萧条情况下西方世界的现实共性,体现了犹太裔作家对当今西方世界的悟识”。(40) 张晓君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只争朝夕》中的主人公对精神父亲的寻找,认为由此可以“窥见作者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富于同情的关怀。”(87) 张群分析贝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认为贝娄在“十多部小说中塑造了一大批可亲可信、有血有肉、角色不同、形象各异的女性”,(75) 由此提出与国外学界不同的看法。修立梅分析了汉德森的精神危机,认为贝娄“成功地再现了一位战后精神出现危机的美国富翁形象”。(86) 段良亮与单小明认为贝娄在《赫索格》中用戏仿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反英雄人物,这使得赫索格“显得十分滑稽可笑。然而在嬉笑之余,读者不免会对这一人物油然而生一种认同、同情乃至赞许和敬佩”。(83) 陶家俊与郑佰青比较了《格列佛游记》与《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两部作品,认为在两部作品中存在着反社会人性母题——“崇尚自然欲求,张扬原始人性,藐视世俗法规”。(142) 刘兮颖认为在贝娄的长篇小说里几乎都“隐含着‘父与子’的主题”:“在表面的故事情节之下,有一个与之平行发展并不断强化的‘父与子’主题的情节结构。根据情节线索的不同,可以分为:‘血缘父子’、‘精神父子’和‘异化父子’”。(论索尔·贝娄 61) 在另一篇论文中,刘兮颖通过探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的“对话”哲学,分析了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与“小说叙事上第二人称的对话性”,认为“对话”哲学“反映出犹太知识分子在当代美国社会面临的伦理困惑和精神危机”。(“对话”哲学 123) 戚咏梅发现,贝娄 60 年创作生涯的人文主义焦点是“重新审视和思考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存在,发掘‘事物的本质’”。(69) 夏光武以贝娄研究为例力图探究在跨文化传播中异族文化的“淡化与深化现象”。他认为,内地贝娄研究者不大关注贝娄作品中的犹太文化因素,在台湾贝娄研究也有淡化的现象,但却发展了研究贝娄作品的“清晰的本土视角”——从佛学的视角考察贝娄的作

品。(128—132) 祝平在一篇论文中探讨了贝娄的最后一部中长篇作品《拉维尔斯坦》，认为该书是“一部由‘真实印象’构成的小说”，“贝娄让我们透过现象，在一个玩世不恭的犹太知识分子身上感受到了他对犹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深切关怀”。(迷宫 79) 在另两篇论文中，祝平与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一脉相承，继续关注贝娄作品中的伦理观，认为贝娄的小说“指向一种超越悲观现实的‘肯定’伦理，使人们在浓密的乌云背后看到一抹亮色”。(肯定伦理观 34) 他还探讨了《只争朝夕》中的“伦理指向”，认为小说关注“个体与自我、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指向一种‘亲社会’伦理”。(士兵 89) 魏啸飞从“纯粹理性与原初情感”，“极端自我与情感意识”，“智慧之树与生命之树”三个视角观照贝娄的《哀思伤情》^①，认为“小说以深切的同情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呼唤人类精神太阳的升起……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美国社会，贝娄渴望用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来保护和珍藏人类的生命火种”。(51) 江宁康探讨了《拉维尔斯坦》中的文化母题，认为“这部小说和作者以往的多部长篇小说一样，对犹太民族坚持不懈地‘寻找自我的民族家园’这一文化母题进行了艺术阐释，展现了当代叙事的文化反思意识和艺术创新精神”。(81) 程锡林分析了小说《洪堡的礼物》的主题，认为“作品通过描写西特林的思与忧，深刻地反映了当今西方的社会问题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14) 籍晓红以《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为例，从消费主义视角考察贝娄的作品，认为贝娄抨击消费主义，并认为“贝娄将消费主义的批判提升到了文化的维度和人文关怀的高度”。(126)

检视内地近年来的贝娄研究颇为让人振奋，一方面是期刊文章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则是新生力量的加入。老一辈学者笔耕不辍，新一代研究者执著进取，可以说内地的贝娄研究在 21 世纪进入了一个比较繁荣的阶段。不过，在喜人的成绩背后，也仍有不足。最明显的莫过于期刊论文，在数量激增的同时，论文的质量并没有大面积提高，具有一定深度的论文仍属极少数。研究贝娄作品的专著从无到有，取得不小的成绩，博士论文数量也有大幅增加，但与此

① 即 *More Die of Heartbreak*，亦译为《更多人死于心碎》。